

博物館與文化 第26期 頁185~190 (2023年12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26 : 185~190 (December, 2023)

書評 Book Review

邊界、權力與觀看視角的改變：評 James Clifford 原著，Kolas Yotaka 譯，2019。《路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苗栗縣三灣鄉：桂冠圖書公司。英文原著：James Clifford,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黎世輝¹

Shih-Hui Li

當代社會中的美術館與博物館正面臨著來自各種異質且多元社群之挑戰與質疑，為了採取行動並對之加以回應，美術館與博物館必須以自身所處的社會與文化脈絡為基礎，重新思考關於博物館立場、機構特性、知識建構與社群性質之「變動中的定義」。尤其自 1970 年代起，地方博物館與社區博物館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實乃回應地方對於文化保存、文化轉譯與文化展示日益增長之需求。地方中小型博物館與傳統都會型博物館之間的互動關係，實為博物館知識論述發展過程中變動與挑戰的歷史 (changing and challenging history)。

這是一本旅行之書、觀察之書，是一位歷史人文學者對當代發生在文化田野中各種邊界移動與權力不對等現象的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書寫。《路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1997) 的英文版於 1997 年出版，距離 2019 年中文譯本的出版已歷

¹ 本文作者為天主教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The author is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經 22 年，雖然書中許多對於當代社會與文化的觀察，在經歷網際網路與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過程後已頗具歷史感，但作者於本書所提出的「移動」、「離散經驗」、「接觸區」、「文化抵抗」等概念仍然在當代博物館學的研究中廣為探討，並持續不斷地幫助人們理解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本書作者 James Clifford 為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意識歷史學榮譽教授，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其學術關懷為當代文化反思論述、比較文化研究、原住民研究、博物館學等。Clifford 於本書運用人類學民族誌的方法，參與、觀察、紀錄並詮釋原住民部落文化在面臨現代西方都會文化的挑戰時，所發展出的文化抵抗與重構。

本書的內容主要是由作者對於人類學田野工作、旅行經驗、博物館觀察、展覽評論與其他離散 (diaspora) 經驗的書寫所構成。第一部分以旅行為題，以人群移動、文物移動與文化移動的層次帶出比較文化研究的視野。第二部分以接觸為題，以加拿大西北岸四個博物館的觀察、倫敦梅非爾 (Mayfair) 人類博物館 (Museum of Mankind) 中由人類學家澳韓龍 (O'hanlon) 所策劃的「天堂：描寫新幾內亞高地」的展示評論，以及博物館作為接觸區的概念來討論博物館場域中正在發生的文化再現與文化翻譯的議題。第三部分以未來為題，討論以離散理論與社群離散經驗思考路徑之文化轉移與文化混雜的故事書寫。

本書的編排與書寫主要由作者本人在不同的田野 (field) 間旅行移動所觀察紀錄的內容拼貼而成，這樣的書寫主要有三層閱讀上的意涵：(一) 作者強調在田野中觀察、研究與書寫的重要性，旅行即是在不同的田野間轉換視角，改變觀看的方式。(二) 旅行而非成為在地者，恰如其分地給予旅行者一種局外觀點，當局外觀點與在地觀點相遇時，文化的挑戰與抵抗便有產生的可能性。(三) 拼貼的內容與多元的題材回應作者所強調的文化接觸路徑，讓不同的學科方法與文化理解在本書中進行接觸與對話。

本書的第一部分以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為旅行的起點，作者認為傳統原始的、部落的田野定義與工作的場域，在交通與通訊日漸便利的現代，可被

視為「方法論上的理想目標以及一個具體的專業活動地方」(Clifford, 2019: 25)。動身前往遙遠的部落進行田野工作，過往來說被視為一種小型的移民經驗，即由局外的觀察者成為局內的定居者。但在全球化的當代，田野與田野之間的界線日趨模糊，伴隨著相對容易且成本低廉的旅行移動過程，「所有第一世界都可以稱為田野，不論是當地人或人類學家都可以頻繁地在田野間進進出出」(Clifford, 2019: 27)。

作者進一步指出，由於田野與田野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密，植根於田野的異質文化群體也成為旅行的場域，與人的移動有關，各種文化彼此之間的接觸、對話與碰撞都日漸增溫，而文化再現的議題也伴隨著自身如何詮釋文化，以及觀光客(旅行者)如何凝視文化而成為各種田野場域關注的焦點。

對於旅行意義的討論，本書作者並非聚焦於觀光休閒脈絡中的旅行，而是將旅行視為與真實世界保持一定距離的研究概念。旅行與單純的移動不同，若由殖民、後殖民、離散、復返等觀點來看，旅行代表著「一系列物質的、生產知識的空間實踐、故事、傳統、風俗、音樂、書籍、日記，以及其他文化表現的經驗」(Clifford, 2019: 44)。觀看的方式豐富且多元，誠如 John Urry 於《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指出：

人們透過觀念、技術、渴望、期待的濾鏡來凝視周遭世界，而這一層層濾鏡由社會階級、性別、國籍、年齡和教育形塑。凝視是一場展演，為這個世界安排先後順序、塑造模樣、劃分類別，而非如實映照。(Urry and Larsen, 2016: 22)

旅行中的觀看在不同的場域與移動的路徑上都隨時發生，其中所反映出的有形與無形的文化交流與對抗，在博物館中表現得最為顯著。本書的第二部分「接觸」即以博物館為田野，首先，在「西北岸的四個博物館：旅行反思」的章節裡，作者透過旅行時參觀博物館的經驗完成加拿大西北岸四個不同類型博物館的博物館誌書寫，對於當代博物館、美術館與地區型文化中心的研究提供了具有比較觀點的分析取徑。這四座博物館分屬兩種相異且極易

產生對抗與衝突的文化田野：卑詩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Museum of Anthropology) 與皇家卑詩博物館 (Royal British Columbia Museum) 為傳統美學與歷史取徑的都會型博物館；而烏米司塔文化中心 (U'mista Cultural Centre) 與卡瓦吉司博物館 (Kwagiulth Museum and Cultural Centre) 則為部落觀點的博物館。兩組博物館展現出當代博物館(文化中心) 做為「文化接觸區」與「具抵抗觀點的文化機構」之兩大特性，而正是在都會型博物館與部落觀點博物館的比較研究脈絡中，旅行者得以感受到地區型文化(弱勢文化) 面對都會型文化(強勢文化) 時所採取的立場與姿態。作者認為：

每一個博物館都是在地的博物館：羅浮宮是巴黎的，大都會博物館就是典型紐約的代表。雖然大眾的博物館都反應其各自的城市與地區，但它們期許自己可以超越這個專屬性，以代表國家、國際或人類的遺產。在曼吉角村和愛勒特灣這種地方，其周遭的社區與歷史必然無法避免博物館帶來的影響。局外人會很好奇，當地人對這些機構參與到什麼程度，而它們對族人的意義又是什麼？...他們怎麼看待這個博物館？關於博物館，他們被教導了什麼？這樣的問題我們並不會馬上產生在大眾都會型博物館和民眾上。(Clifford, 2019: 157)

本書以接觸區 (contact zone) 的概念作為理解博物館的一種方法，作者援引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的《帝國之眼—旅行與文化轉移》(*Imperial Eyes: Travel and Transculturation*) 一書中對於接觸區的定義：「殖民遭逢的空間、地理與歷史相異的人遇見彼此，建立持續的關係，通常包含了高壓、極端不公平與棘手的衝突的成分在內」(Pratt, 1986: 6-7; Clifford, 2019: 234)。接觸區作為兩種文化相遇之處，對於部落的博物館而言，在面對都會型與國家博物館的文化治理時，將由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而引起捍衛在地文化與對抗外來文化的各種行動。本書作者指出，博物館被視為一個接觸區，則在其收藏的組織結構中就會產生中心與邊陲之間的關係，都會中的博物館通常被視為是文化聚集的中心，而部落的、地區的博物館與文化中心則是在中心往

外擴張的過程中不斷被發現的地區。誠如作者所指出，中心與邊陲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權威式的拯救、照顧與詮釋那些被發現的文化內容 (Clifford, 2019: 235)。本書作者也認為，部落博物館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抗的，博物館中的展覽呈現了被排除在外、邊陲的、與殖民的過去對抗的經驗。在部落博物館中所再現的在地與社區觀點則會持續不斷地對統一的、全國性的觀點進行挑戰與批判。(Clifford, 2019: 151-152)。

對於部落的博物館而言，去中心化的努力與實踐在博物館的典藏、研究與展示工作中日復一日地進行著，尤其是在當代博物館學引起關注的文物返還議題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本書認為，文物與藝術品由部落往大都會區的博物館移動，是一種殖民系統支配下的結果，其中涉及到大型博物館以搶救文化的姿態來進行部落文物的收藏，這樣的文化移動會產生文化挪用並導致爭議產生：誰擁有文物？誰能夠詮釋文物？誰能夠展示文物？這些問題在特定文化場域的局內人與旁觀者一即旅行者之間激起熱烈的討論。作者指出：「在大型博物館中的展示品本身就是旅行者，是過客」(Clifford, 2019: 260)。

本書作者的博物館誌書寫，提醒博物館工作者一個重要的事實：博物館作為文化與族群的接觸區，文化邊界的位置勢必會不停地轉移，由邊陲往中心移動；或是由中心移往邊陲。人群移動與社群的離散經驗在博物館中的展示與翻譯，透過人所攜帶的物件，博物館可以建構文化的三種層次：其一為社群的原居地經驗與故事、其次為社群移入地區的生命經驗與故事、最後一個層次則為上述兩層生命經驗的對抗、碰撞與融合。在文化接觸區中，有形的商品、生活物件、貨幣等透過貿易與交換而形成不同群體之間互相理解的基礎；而無形的資訊、文化、信仰、價值體系、認同則隨著接觸而產生融合與抵抗。博物館基於蒐藏來自不同社群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也同時再現社群之間的交流與對抗。

參考文獻

- Clifford, J. (2019)。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Kolas Yotaka 譯)。苗栗縣三灣鄉：桂冠圖書公司。(原著出版於1997年)。
- Urry, J. and Jonas Larsen(2016)。觀光客的凝視(黃宛瑜譯)。台北，書林出版。(原著出版於2012年)。
- Pratt, M. L., 1986. Field 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7-50.
- Pratt, M. L., 2007.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